

春秋战国时期的 儒法斗争

北京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批林批孔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锋芒直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直指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及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的各种思潮和学派，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一种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法家和儒家的斗争，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激烈斗争的反映。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而儒家是代表倒退和复辟的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学派。

一切反动派，包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本来是一个不读书，

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是他却在阴暗的角落里，大量搜集孔孟的反动言论，狂热鼓吹儒家，极力诋毁法家，咒骂秦始皇，打起尊儒反法的黑旗。林彪尊儒反法的罪恶目的，是妄图借助孔老二的亡灵，在中国开历史的倒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就充分说明，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就不会结束，儒法斗争的影响还会继续存在。

当前开展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斗争，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配合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深入批林批孔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本书供参考。在编写中，我们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评价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并力求内容简明扼要，语言通俗易懂。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离这样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编写工作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阶级斗争和

儒法斗争的概况 1

第二章 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

反动学派——儒家 12

第一节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 12

一、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克己复礼” 13

二、德治和忠恕之道 19

三、反革命的“中庸之道” 23

四、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和天才论 27

五、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教育思想 30

第二节 复辟奴隶制的顽固派——孟轲 35

一、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仁政” 36

二、为仁政作论证的“性善论” 42

三、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论” 46

第三章 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

进步学派——法家 53

第一节 法家杰出的政治家——商鞅	54
一、战国初期的法家李悝和吴起	54
二、商鞅变法	56
三、商鞅变法过程中儒法的激烈斗争	60
第二节 法家卓越的思想家——荀况	63
一、反对“世卿世禄”制，主张“法治”和“尚贤”的政治思想	64
二、反对复辟奴隶制的“法先王”，提倡维护封建制的“法后王”	67
三、反对唯心主义天命观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70
四、反对神秘主义“天人合一论”，提出“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的天人关系论	72
五、反对先验论，提出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76
六、反对性善论，主张性恶论	80
第三节 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	83
一、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服务的“法治”思想	84
二、反对复辟奴隶制的“法先王”	88
三、战斗的无神论思想	93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概况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就建立了夏王朝，我国社会就由原始公社进入了奴隶制时代。中经商朝，到西周都是奴隶社会。由于奴隶反对奴隶主的阶级斗争，推动着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即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在奴隶制的母体中孕育着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使奴隶制逐步解体。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封建制度基本确立时期。旧制度的灭亡，新制度的产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发展过程，而是充满着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一齐激化起来，形成了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

奴隶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奴隶反对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发展的空前的剧烈，奴隶纷纷起义，

如火如荼，形成燎原之势。例如，当时有一支以柳下跖为领袖的奴隶起义队伍，有九千多人。柳下跖当时享有很高的威信，荀况说他“名声如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荀子·不苟》）在《庄子·盗跖》篇中记载，这支队伍“横行天下”，到处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奴隶起义队伍所过之处，吓得奴隶主贵族们，大国紧闭城门防守，小国则龟缩在土城堡，不敢出来。可见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的规模和声势的浩大。在城市里有称作“国人”的手工业者和自由民，反对奴隶主的斗争也空前激烈起来。如公元前 644 年齐国的役人暴动，公元前 624 年沈国的“民溃”，公元前 550 年陈国筑城役人暴动，公元前 520 年周王室的百工叛乱，公元前 478 年和 470 年卫国匠人的暴动等等，说明“国人”的起义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奴隶和“国人”的起义斗争汇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疾风暴雨地冲击着奴隶主的统治，摧毁着奴隶制度的统治基础。

在奴隶们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推动下，春秋初年发现了铁器，逐渐推广使用铁制农具，再加上这时期又发展起用牛耕田，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时，有些奴隶主开始使用奴隶在奴隶制的井田（也称公田）以外，开垦荒地。有一些自由民也使用新式农具开荒，成为进行小规模生产的自耕农。这些新开

垦的土地，谁开垦的就归谁所有，叫做“私田”。“私田”越开垦越多，其数量逐渐超过奴隶制井田制的“公田”，于是随着也就出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有些奴隶变成了封建依附关系的农民。社会上产生了地主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新的生产关系。因为私田数量的迅速发展，有的诸侯国为了增加税收，开始向私田征税，如鲁国在公元前 594 年实行的“初税亩”，就是开始向私田征税，承认土地私有制。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渐发展起来。这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爆发了连绵不断的兼併战争，在战争中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不断遭到打击和削弱，战争的暴力也促进了新兴的封建势力的发展。伴随着奴隶制经济的瓦解，奴隶制的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的政治制度也必然走向崩溃，原来维护奴隶主统治的那套“礼制”逐渐失去它的统治力量。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发展壮大，到春秋末期，不仅不遵守奴隶制的“礼制”的规定，而且走上了革命的夺权的道路，于是各诸侯国内部经常发生臣杀君，子杀父的现象。奴隶制的政治制度面临着土崩瓦解之势，出现了奴隶主们惊呼为“礼坏乐崩”的天下大乱的局面。这种大乱正是乱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没落奴隶主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妄图进行垂死挣扎，维持他们的

统治。而代表新的封建主义制度的地主阶级则积极摧毁奴隶制，建立封建制。在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这个转变时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形成了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

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定的学派和思潮都是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战国时期，封建制度虽然已基本确立，而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里的斗争更加集中和激烈。被赶下台的反动奴隶主阶级，时刻都想复辟奴隶制，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一部分代表他们利益的反动知识分子，猖狂地攻击封建主义的统治，大造复辟舆论。因此，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从春秋末期开展起来的思想斗争，到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阶级的思想代表都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各种学派、各种思潮纷纷出现，都来争夺思想阵地。当时学派很多，提出的问题也很多，但归根到底主要是围绕着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社会制度而展开的。在政治上是围绕着前进还是后退，变革还是反变革，复辟还是反复辟这样两条路线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反映到世界观上则表现为：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

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天命论还是反对天命论的斗争。

当时斗争最激烈而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法家和儒家两派。

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和发展，在春秋末期出现了反映他们的政治要求的早期法治思想的萌芽。如郑国的政治家邓析作“竹刑”，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荀寅“铸刑鼎”等，都是以公布成文法的形式，把奴隶和奴隶主应遵守的法律公布出来，以便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大众同奴隶主阶级作斗争，奴隶主阶级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要进行制裁，这就打破了“周礼”关于“刑不上大夫”的规定，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开辟了道路。鲁国革新派领袖、法家的前驱少正卯，积极宣传进步思想，“记丑而博”，无情地揭露了奴隶主阶级的残暴罪行，为摧毁腐朽的奴隶制建立新的封建制“大喊大叫”，大造革命舆论。

与此相对立的，在春秋末期，出现了一个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维护旧制度、旧传统、旧道德和旧文化的反动学派，这就是以孔丘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本来在孔丘以前就有一种所谓儒者的职业，这是一批奴隶主贵族豢养的知识分子。他们平时不参加

生产劳动，游手好闲，只是当奴隶主贵族死了人，他们才给奴隶主贵族办理丧事，按照周礼规定的丧礼仪式，喊礼，当吹鼓手，借以混些酒肉衣食。孔丘青年时代，因为他出身于没落奴隶主家庭，放不下贵族的臭架子，轻视生产劳动，因而也曾从事于这个职业。他曾说过：“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这就完全勾划出这伙儒者的形象。杰出的法家思想代表荀况曾经深刻地揭露了这帮寄生虫们的丑恶嘴脸，说这些人整天口谈“先王之道”，到处骗人，混些粮食足以糊口，则洋洋得意起来，到社会上结交一些有权势的贵族，像个奴才一样求得人家的保护。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墨翟也曾讥讽过这些人的丑态，“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下》）由此可见，儒家最初不过是依附于奴隶主贵族这张皮上的寄生的反动知识分子集团。

孔丘为了维护腐朽的奴隶制，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出了一条复辟倒退的“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他又继承了奴隶制的精神支柱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天才论，作为他的反动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他象一条丧家狗一样到处奔走，宣扬他的反动思想，并极力地反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和“铸刑鼎”等新生事

物。当他听到晋国“铸刑鼎”的事以后，就咒骂晋国快要灭亡了，狂叫晋国破坏了周朝的奴隶制，把奴隶主和奴隶都铸在鼎上，这还能显出奴隶主的尊贵吗？取消了贵贱的区别，那还成为奴隶制的国家吗？孔丘晚年作鲁国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并代理宰相的职务，上台三个月就杀了革新派的领袖少正卯。当然孔老二的屠刀并不能阻止新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因为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反映他们要求的新思想也必然发展和传播开来。这只能暴露孔老二口喊“德政”，言行不一的凶残本质，这也表现了春秋末期儒法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奴隶大众不仅是以武装斗争摧毁奴隶制的主力军，而且也是最早在思想上批判孔丘反动思想的主力军。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首先举起了批孔的大旗。他面对面地对孔老二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尖锐地指出，孔丘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专门“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为了谋求“封侯富贵”，到处游说，“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妄作孝悌”，用这些编造的黑货迷惑人心。柳下跖还指出，孔丘吹捧的所谓“先王”，都是一些为了个人利益“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乱人之徒”，这些人的作为不仅不值得推崇，实在令人感到害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孔

丘实际上是当面奉承人而背后又好骂人的“巧伪人”，是“罪大极重”的两面派，是货真价实的“盗丘”。奴隶对奴隶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有切身的感受，所以对奴隶制最痛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最坚决。因而他们对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孔丘的批判最有力，也最能击中要害。他们是批判孔老二复辟思想和复辟活动的主力军。

从春秋进入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在各国逐步取得政权，由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改革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建立符合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的改革过程中，必然更加深刻地触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因此，在整个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缓和，而是更加尖锐和激烈。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反抗，完成建立新的上层建筑，实现全国统一的任务，必须从经济到政治全面地强化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并从思想上打退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学派的猖狂进攻。战国初期，出现了如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这样优秀的法家，而形成了一个法家学派。特别到了战国中期杰出的法家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在激烈的斗争中，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路线，对没落奴隶

主贵族以及他们的思想代表儒家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打击。

没落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必然进行疯狂的反扑。和商鞅同时的孟轲，是战国时期臭名昭著的儒家代表。他代表垂死挣扎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公开跳出来，对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政治路线，进行了全面攻击。他把孔丘的“克己复礼”发展为“仁政”，作为他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并编造出了“性善论”，“法先王”，“天人合一”论等唯心主义哲学，为他的“仁政”作理论论证，成为当时反动奴隶主阶级主张复辟倒退，反对前进和变革的一个主要代表。他紧步孔老二的后尘，到各国游说，鼓吹他的反动思想。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复辟奴隶制，推翻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因此，一场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儒法论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法家卓越的思想代表荀况和他的学生韩非，迎接了这场战斗。荀况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政治思想战线上斗争的经验，对各个学派特别是对儒家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韩非在继承荀况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他以前的法家思想而成为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因为荀况、韩非有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所以他们抓住儒法斗争的主要问题，对儒家进行了有

力的批判。儒法斗争的长期经验，使他们认识到这场斗争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反动政治主张，和为他们的反动政治主张作论证的谬论。荀况明确提出儒家“术谬学杂”，“足以乱世”。(《荀子·儒效》)韩非则指出“儒以文乱法”，儒法论争“是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韩非子·五蠹》)。不粉碎这种反动理论，法治路线就不能贯彻，并把儒家比作腐蚀新政权的蠹虫，必须坚决打击。基于这样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儒法斗争的几个重要问题，如“礼治”与“法治”之争，以及“仁义”与“功利”之争，“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天命与反天命之争等，荀况和韩非都对孔孟之道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和斗争，给予儒家的反动思想以有力的打击，并在斗争中建立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他们宣传法家思想，批判儒家的斗争，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扫除了思想障碍，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秦始皇完全继承了商鞅、荀况和韩非的法家思想，并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加以贯彻执行。他是一位杰出的法家的政治实践家。在法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他胜利地完成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历史任务。但是儒法斗争并未因此而结束，反

动奴隶主贵族和他们的思想代表仍然不断地进行破坏和捣乱。秦始皇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从政治到文化思想，全面地对奴隶主贵族实行专政，下令烧毁了儒家用来诋毁新政的《诗》《书》等儒家书籍，镇压了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四百六十个儒生，这就是有名的“焚书坑儒”。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是以法家的胜利，儒家的失败而告终的。

第二章 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 利益的反动学派——儒家

儒家学派创立于我国春秋末期。它是适应于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抗社会革命，维护腐朽的奴隶制度，企图使历史开倒车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丘和孟轲。

第一节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

孔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省曲阜东南）人。孔丘的祖先是宋国的奴隶主贵族，父亲叔梁纥做过鲁国的陬邑的武官，他出生于一个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孔丘一生为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而四处奔波，到处游说，宣传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晚年做过短期的鲁国的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和代理宰